

深切怀念恩师吴征镒院士

李锡文

(1931~)，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我的大半生明显与“植物志”（Flora）结缘，有三个大奖（《中国植物志》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唇形科的起源、分类与分布”的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以及“中国生物志”的香港求是基金会科研集体奖）均与此有关，这些奖使我感到不会为此生“虚度年华”而悔恨。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我遇到一位贵人，也就是恩师吴征镒院士相助而感到终生有幸。为此我深切感恩吴征镒院士。

回顾我与恩师吴征镒院士相识于1954年8月。那时，我刚从河北农业大学园艺系果树蔬菜专业毕业，那年才23岁，组织分配我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该年吴征镒院士担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我和我爱人宣淑洁到植物所报到后，他把我们再分配到远在西南边疆的植物所昆明工作站（即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工作站那时工作及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也只有十多位员工。看来他认定我会在此艰苦环境中茁壮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才。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学农，在当时植物所议论认为不是“名校”或“科班出身”，不会在植物学（尤其是当年植物所是植物分类研究所）或植物分类学上有多大贡献。而我和我已故爱人确实在昆明工作站、在植物分类学上做出不少工作或贡献，现在想起来吴征镒院士当年在用人上是有远见卓识的，我和我已故爱人也因而成为现今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而感到自豪。

我到了昆明之后，吴征镒院士要求我参加中苏紫胶考察队、中苏生物资源考察队、橡胶宜林地考察队以及多次滇西北森林资源考察队，前后历时六年之久。在考察中他言传身教，使我对植物



1981年1月于广东南海西棋山



1989年8月9日，应浚生、吴征镒、李锡文、陈书坤于昆明植物所



有许多感性认识，由原来不识一草一木的农学生转变为能认知三千种以上植物的人。使我知道什么是植物标本采集和制作，对植物标本如何观察研究，如何分科分属，再送到植物馆入柜全过程，同时也教会我如何做标本馆的“门市工作”（即标本鉴定），渐渐地培养我对植物分类的兴趣，增长我对植物分类学的认知，使我从一个学农外行的人转变成为一个与植物结缘的人。植物分类学需要多门学科知识，标本馆及图书馆是其两大支柱，要熟悉文献就必须懂得多国文字，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语种的文字，吴征镒院士不仅领我入门，而且还要求活学活用。

原先昆明工作站只有小小规划——编写昆明地区植物志。但自1958年吴征镒调任昆明植物研究所当所长后，就带领我们分类室全体同志编写《中国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两部巨著，以此作为长远目标。现在这两部植物志都已完成，前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后者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特等奖。在编写这两部巨著过程中，吴征镒不仅作为主编，而且还言传身教，使我们受益匪浅。有两点令我感觉非常深刻：

第一点，他带我们用“产地模式”（*Topotype*）方法破解了当时国内被发达国家封锁的局面。要知道，搞植物分类研究，认识模式标本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像一个标尺，对种群的划分有极大价值，见到模式标本就等于见到种的“标准”，有了“标准”对种群的划分就比较容易。当时也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前，由于发达国家对我国全面封锁，一些原产我国的种的模式标本由于历史原因大都保存在一些发达国家标本馆中，因为这些国家开展近代植物学研究比较早。这些模式标本在当时我们不可能借到，也没有可能或没有条件到它们标本馆中见到，我们要做自己国家或地区的植物志，又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吴征镒院士提倡“产地模式”方法就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谓“产地模式”是指与全模式标本所采集的同一地方（甚至同一植株）的植物标本，它在形态特征及其他方面均与全模式标本几乎是完全一致，其可靠性是在90%以上。

第二点，他带领我们用“形态地理学方法”（*Morphological - Geographical method*）来解决植物种群的划分问题。植物志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对各等级分类群进行划分，而最基本的就是种群的划分。什么是种群，不同学者或不同作者就有不同看法，难以找出一个共同认可的统一标准。他基于隔离（*isolation*）或严格来说的生殖隔离（*sexual isolation*）意义上有一定分布区，在形态特征上又有差异的所谓“形态地理学方法”来进行种群划分，这不但便于应用，而且也能解决许多疑难问题。

我自从到昆明工作以来，都一直协助吴征镒院士做一些学术秘书工作，也先后当过多年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及研究室负责人（研究室主任）。在这些工作上，由于当他的助手受益匪浅。他的谦虚、尊师爱徒的精神令我很有感受。他不单对其自身的老师如唐耀、徐仁是十分尊重，而且对其同辈的如徐永椿、薛纪如二位教授也是十分尊重的。徐永椿是西南林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前身）院长，有名的山毛榉科专家，其弟子王从皎带了三棱栎的一份标本来我所请求鉴定，其后我定为我国当时新发现的三棱栎植物时，在论文发表我们两个单位署名时，他坚持要让西南林学院徐永椿及王从皎写在前面。在发现龙脑香科望天树植物时，吴征镒院士要我礼让，坚持以集体名字即望协（*Wang Hsie*）来署名。他的这些言行，以大局为重，对我当时争名争利的思想是很大鞭策。这两件事直到现在我还是有些许想不通，搞科研不为个人名利又为什么呢？我只能从以大局为重、宽阔的胸怀来理解他为人之大恩大德。

我在协助他工作过程中，例如在审查稿件时他为何有这样的评语和见解，常思考他的研究方法，是如何对一些问题思考及下结论的，为此我花费了不少时间，常常在他审定一件稿件后花上一





1996年8月，“中国生物志”获香港求是基金会杰出科学成就奖，由吴征镒、饶钦止、曾呈奎、李锡文分获。

周时间看完此稿件的全部文献，寻找他思路及想法的足迹。这常令我非常叹服，他真如一座智慧的喷泉，使我受益匪浅。也许在我看来就是他所希望走科研“安、钻、迷、呆”道路的人。

他对学生要求极严，也要求很高，想起当初为什么他让我搞一个在分类学上难度很大的樟科，看来就是要求我成为一个多少对植物分类有贡献的人。现在可以说，我基本上做到了他所要求的，也聊以自慰。

现藉恩师吴征镒院士逝世一周年纪念之际，我有触而发写了上面一些体会和感想，无非是表达我对恩师一片感恩之心。人一生中遇到贵人不易，有贵人相助会幸福一生，恩师吴征镒院士不但影响我这一生，使我成为对国家多少有用的植物分类工作者，同时也影响我们父子二人从事植物研究的信心。

恩师吴征镒院士，安息吧！你的光辉思想永远照耀着后人踏入这个绿色王国去探宝。

